

落英（下）

——早年讀書生活的回憶——

魯 國 堯

南京大學

學在城裏城隍廟附近，靠家要近些。

在泰州的中學裏，教師大多數是本地人，但也有些是外路人如揚州人、蘇南人，只有少數教師用「國音」教課，我們學生清一色地是泰州人或泰州鄉下人，學校裏還是泰州話的天下。我的初一下的成績單的「科目」欄有「政常」、「國文」、「外國語」、「圖畫」，而初二下的成績單則為「政治」、「語文」、「英文」、「美術」。我還是喜歡國文課，也喜歡作文，作文本子一發下，急乎乎地先看的是先生打「甲」還是「甲下」，初二時的語文老師朱譜夏先生打等第打得嚴，我們兩三個得「甲下」的同學糾合起來，居然帶有幾份悻悻然地提出：「朱先生，這題目你做篇給我們看看。」（泰州話裏沒有尊稱「您」，都是「你」。）對我們的無理要求，朱先生一笑置之。有次作文競賽，我得了第三名，獎品是恩格斯的兩本書的中譯本。政治課除了時事學習外，是講社會發展史，那時參加革命的工作幹部都學解放社的一套叢書，其中一本是《社會發展史》，我們初中生學的則比較簡單，道理則一樣。我在溱潼上初一上時，沒有外文課，並非溱潼中學沒有英文教師，而是因為有位領導說：「學英文就是放洋屁。」泰州

解放後設置了蘇北行政區，蘇北行政公署曾短期設在泰州光孝寺，不久遷往揚州，光孝寺前隨後掛上了「泰州專員公署」的木牌。一九五二年蘇北和蘇南兩區合併建省，省會設於南京，泰州專區變成揚州專區，泰州市（跟泰縣分合數次）也跟着降格。

我在溱潼中學上了一學期，就到泰州做插班生了。解放初期泰州有兩所中學，一是蘇北泰州中學；一是泰州私立聯合中學，是由以前的時敏中學等合併而成，一九五一年改名為蘇北私立泰州中學，後名泰州市泰州中學，以別於江蘇省泰州中學。一九五〇年初陰曆年後全家搬到了泰州，聯合中

到底是大地方，中學裏照開英文課，雖然當時是抗美援朝的時期。我和姐姐魯國茹轉學到泰州，就吃虧了，期中考試只得申請免試，期末考試我們却都得了高分，所以才能得到學習二等獎。

課堂學習放下不表，還是談課外讀書情況吧。我沒有看多少數理化的參考書，興趣在文史。中學圖書館的書可多啦，例如魯迅逝世後不久許廣平主持編輯出版的紅布面《魯迅全集》二十卷，就逐本地被我借到家中。我們最崇拜魯迅，他的《吶喊》、《彷徨》我們都讀過，不過後者除《祝福》、《高老夫子》以外，印象都不深。我們喜歡《朝花夕拾》、《故事新編》、《鐮劍》中的「肩問尺」十分感人，《藤野先生》開篇提到東京的上野公園，不意九十年之後，我來遊學，每當經過上野公園的時候，我就緬懷起生值民貧國亂之際遠來東瀛的魯迅先生，撫今追昔，感慨萬千。我們也熟讀他的雜文如《友邦驚詫論》、《紀念劉和珍君》，至今還背得其中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篇文章比目睹身歷「三一八」屠殺案的朱自清的記敘文更動人，更富哲理性，所以「衆口傳」了。也看了不少

巴金、茅盾的作品。

老解放區的作品在中學生中廣為流傳，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影響較大的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因為都曾得過斯大林文學獎金。周書中的老孫頭的形象我至今還記得，丁書給我的印象只是文筆好，形容詞多，中學生做作文時是很需要詞藻的。中學生比較重視散文，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選到中學課本裏，是最有影響的，「當你坐上早晨第一班電車馳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成了我們刻意模仿的樣板，楊朔的構思精巧的散文我們也喜愛，劉白羽的散文雕琢太甚。朱自清、冰心的散文被說成小資產階級情調很濃，教科書中不選，我們也不再讀了。

解放後，「一邊倒」，學習「蘇聯老大哥」，俄國和蘇聯文學大量介紹到中國來。普希金、萊蒙托夫、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我都不愛讀，樓梯式的詩很怪，佔地方，看了不順眼。我們看過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這些反映蘇聯內戰和對德戰爭的作品，而《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都是四卷，望而生畏，沒有耐心看。

我繼續看了些中國神魔小說和武俠小說，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榜》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一個法寶祭起，馬上敵方威力更大的法寶升空；手一指一道劍光，另一位仙人掌指上的金光也騰空而起，法寶、劍光在空中相擊。有時，小讀者們直盼知道誰贏了。法國人說，二十世紀的科技成就都是凡爾納科幻小說的體現，我這個中國人要說，一九九一年春的海灣戰爭就是《封神榜》和《蜀山劍俠傳》的體現，飛毛腿導彈被愛國者導彈在空中擊落，與仙人比寶、劍仙鬪劍何其相似乃爾。《蜀山劍俠傳》和續傳出版了五十本之多，還未寫完，也許是世界上最長的小說了。放學回家的路上在大東橋附近的書攤兒上兩百元（相當於後來的兩分錢）租一本，入了迷，功課都不做，第二天就去換一本。這書近兩年又影印出版了，令我回憶起那逝去的少年歲月！

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是從初中開始的，小時聽父親吟咏古文、古詩（一般人都把舊詩叫做古詩），也背了些簡單的

落英（下）（舊）

詩。到初中時全家搬到泰州，受教的機會就多了，我買了本六十四開的筆記本，抄了不少詩，有曹操的「對酒當歌」，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等等。唐詩的長篇《長恨歌》、《琵琶行》、《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兵車行》等都能背得。我也開始買線裝書了，《白香山詩集》、《李太白詩集》都是那時買的。我喜歡白居易的淺顯，李白的豪放，不能理解杜甫的深沉。中國有句古話：「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因為年輕時血氣方剛，易受水滸好漢義氣的感染，老來閱歷多，再看三國，就謀深慮遠了。我套用來，也說兩句：「少愛讀李白，老方知杜甫。」到了飽經家國憂患的中年，就覺得李白「不深」了，《秋興》成了我經常低迴吟哦的詩篇。

解放初期過陰曆年的時候，泰州城裏人民路（抗戰時叫明江路，緣於李明揚、李長江之名）上有許多攤兒，很熱鬧。在書攤上我買了部石印本《聊齋誌異》，就再也不願意跟着大人去拜年了，那幾年就在迷人的狐仙鬼怪故事中度過。這可以算是補上了缺門兒，父親講的故事有的就來自於這文言小說，從此我也有發言權，也可以插上兩嘴了。

有一次父親回溱潼，帶回了好些書，是母親的堂弟文壘

舅舅送我的，他很喜歡讀書，線裝書就有很多，如三蘇文集等，聽說破四舊的時候，怕紅衛兵來抄，就自己燒掉了。太

可惜了，他是老店員，成份蠻好的，怕什麼呢，不過小地方也難說，何必惹禍呢。舅舅知道我愛讀書，送了這些給我，其中有《諸子精華》，四厚冊，我沒怎麼翻，我是個沒有哲學頭腦的人，至今《荀子》、《莊子》都沒讀完。我把《二十五史精華》看了個大部份，父親不久又給了我一本石印的《史記菁華錄》，從此帝王將相、文人學士、販夫走卒的生老病死、興衰榮辱的史實比大多數歷史小說更能吸引我，閱讀《東周列國志》、《西漢演義》、《東漢演義》，就居於次要的地位了。

唯獨我們一九五二年的那一屆初中畢業生不用考試，分配進高中，我被分配到蘇北揚州中學，那時我又矮又小，父母捨不得我到外地去上學，但是社會安定，風氣很好，是我自己一個人拿着行李和同學一道乘輪船去揚州的。而今南京大學每逢新生報到時，每個十七八歲的空着手的「學子」都有一兩個到三四個「跟班」的前呼後擁，肩挑手提，父母必居其一或其二。小報記者照例在此時點查校門前的轎車數量，

揭露做官的好爸爸用公車送子女上學。不過近兩年不見這類報道，大概是習以為常了吧。

揚州是歷史名城，江蘇省揚州中學（我的成績單從高一一起改成此名）在全國赫赫有名。到了揚中，果然是「更上一層樓」，從校門直往裏看去，是樹人堂，高聳的五層樓，還是抗戰前蓋的，這在今日的中學裏也許不罕見了。顯微鏡有一百多架，一隻大海龜的標本放在實驗室的正中檯上，圖書館有好幾萬冊藏書，二十五史、鄭振鐸的《世界文庫》都有，後者我曾借閱過七八本。從淮海路沿着校牆往北不多遠，就是瘦西湖風景區，虹橋、小金山、五亭橋、觀音山、平山堂，春日裏在桃紅柳綠的湖畔且談且行，其樂也融融。梅花嶺的史公祠我們常去澆弔，多次走過牆嵌方石塊的阮公太傅（即阮元）家廟，還爬上了旌忠寺的文選樓。比起泰州來，揚州大多了，文化發達多了。

一九五二年中國實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大學按蘇聯模式改造，大規模地調整院系，文學院和理學院合併成了綜合大學，只剩下十四所。其餘都應該叫做學院，但是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沒有叫學院，五八年的大躍進時期，不少學院戴上

大學的帽子，這十幾年，更多的學院改成了大學，而且企圖突破蘇聯的模式，例如南京工學院改名為東南大學的同時，辦起了社會科學系，南京大學辦起了醫學院，不過至少現在還不成氣候。我進揚中時，中學也進行了改革，不教英文，改教俄文了。當時掀起了個學俄文的全國性的熱潮，好多名教授如王力先生都是在這時候學俄文的，據說朱光潛以九個小時而初步掌握俄語。中學、大學都改教俄文，教師從哪兒來？兩年速成，更好的辦法是原英文教師改學改教。我們的教科書是《俄文津梁》，翻來覆去地老是一個句子，令人生厭。我們是普通高中，却教製圖課，我們都買了畫板、丁字尺、繪圖儀，畫三視圖。有位泰興縣黃橋鎮農村的同學用豆油搽平了頭髮，打着丁字尺，挾着厚厚的《俄華辭典》（莫斯科外文局出版，厚得像《廣辭苑》第三版）在鄉下田埂上走，開學後傳為笑談。要學達爾文理論基礎課，下冊最後講米丘林、李森科的遺傳學。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的教科書全部譯自蘇聯，據說其深度並不及中國長期使用的《三S平面幾何》、《范氏大代數》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的中國人自編的課本。

落英（下）（魯）

我上高中的時候家搬了，房東仲一侯先生是泰州耆老，六十多歲，解放前曾做過時敏中學的國文老師，解放後以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的身份領取一筆補助費，他家的好多房子逐漸地租給人了。仲一侯先生的父親是前清舉人，去世前我還見過，白長鬍子拖到胸前。他家中進堂屋梁上懸掛有一塊金字木匾，正楷「錫爾純嘏」，是民國江蘇省長韓國鈞寫的。韓字紫石，泰縣海安鎮人，編刻過《海陵叢刻》（西漢置海陵縣，治所在今泰州）。因他對敵大義凜然，一九四三年新四軍置紫石縣，一九四八年起才改為海安縣。仲一侯先生有位叔叔清朝末年在日本留過學，娶了個日本太太，帶回泰州，後因生活不習慣，回國去了，我曾在仲家見到過這位駝背的龍鍾老人。仲師母是一位縣太爺的小姐，我有次念李益的《喜見外弟又言別》詩，念出「話罷暮天鐘」，她和藹地糾正我，應該是「語罷暮天鐘」。我家和仲家是通連的，父母親在我假期回泰州的時候，要我向仲先生學習，仲先生也收下我這個學生，解放了，是不用行磕頭的拜師儀式的，只需不時送些糕點作「束修」就可以了，我按時到他堂屋間去受課。仲先生整天在家讀書寫詩，夏天穿一件中式白色長褲，繫一腰帶，

赤膊，挺着腰板，吟咏古詩或古文，洪亮之聲我家也聽得清楚，我母親常說：「仲先生又唱了。」他教我詩，要我模仿他吟咏，他「唱」一句，我也跟着「唱」一句。這種吟咏跟現代朗誦很不同，朗誦都用普通話至少是泰州普通話（指泰州人努力說的不標準的或很不標準的普通話），而吟咏則全用泰州話。我想，會吟咏的都是老人，多是說方言的，所以他們用方言吟咏，其實自己平常說什麼話，就可以用什麼音朗誦，普通話、藍青官話又何嘗不可？重要的在乎速度，拖腔與搖曳。吟咏的速度很慢，「唱」得每個字音都拖長，假如是七絕，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和第七字（末字）比其他字來，其後拖音要長。如果再在數者間作比較的話，第四字拖得長些，而且搖曳許久，可以在一分鐘以上，然後吐出第五字。句末字拖腔、搖曳的自由幅度當然更強，不過根據詩意的連貫性和吟咏者對詩的領會，第一句末及第三句末往往拖得不長，旨在連接下句。第二句末則多搖曳較長時間，第四句即末句不用說了，必然拖腔、搖曳許久許久。但據尾句的詩意又有變化，如果吟咏的是王昌齡的《從軍行》，末句「不教胡馬渡陰山」最後三字高亢，拖腔、搖曳聲音更是高了，令

人情緒激昂；如是陳陶的《隴西行》，吟到第三句「可憐無定河邊骨」時，就把聲音壓得較低，轉入第四句，「猶是」略升高，接着到「春閨夢裏人」，慢而低，「人」後則低迴婉轉地搖曳許久，換口氣再搖曳，同時頭與身體也隨着搖曳的節奏而緩緩地左右晃搖，那聲音頗有「如泣如訴」之味，吟咏者鼻酸淚噙，聽者亦首低眉蹙。搖曳之聲漸漸地有如遊絲，向遠處逝去，逝去，終於消失了，雙方默然，此時無聲勝有聲。仲先生的吟咏必有家法兼有師法的，可惜的是，沒有音樂耳朵的我當時不會模仿得像，仲先生沒有給我「畢業證書」，我又沒想到向先生討「要點」、「祕訣」，更談不上錄音了，以上的文字描摹不免走樣失真。不過今日五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已不了解古詩文的吟咏，怕要失傳了。我就盡我所知以拙筆傳述幾句，權作引玉的破磚吧。仲先生還結了個詩社，帶我「列席」過一次，他也教我寫詩，我勉強擠出兩句，再也出不了第三句了，他輕而易舉地給我湊上了。那時我不懂平仄，搜索枯腸對對子也是苦事，自知不是詩人的料子，仲先生也不勉強。仲先生沒有給我打「基本功」，也就使我視做古詩為畏途。仲先生家一房間的書，解放初期已論斤稱掉許

多了，三年困難時期又用籬裝了賣，剩餘的在破四舊時，全抄走了。我很感激仲先生教我古詩，還支持我研究泰州方言史，提供了許多文獻資料，幫我作調查。

解放初期東西便宜，物價穩定，寄宿生每月伙食費柒萬五千元（按一九五五年以後迄今的幣制，爲柒元五角），兩稀一乾（即早晚吃粥），可以省點錢買些舊書，那也是比較便宜的。每逢星期天，我們可以出校門，到揚州浴室洗個澡，轅門橋的新華書店和小東門的舊書店是必然要去的，最值得回憶的是買了本《唐詩別裁》，國學基本叢書本，硬紙面快掉了，假期回家向媽媽要了塊白布糊好了，父親用毛筆寫了書名，至今保存着。這書比《唐詩三百首》收的詩多多了，沈德潛的簡注和評我都愛看。那時也背了許多詞，小本子抄得厚厚的。高中時借得魯迅編的《唐宋傳奇集》，當時也是從頭讀到尾。我很奇怪，我對《聊齋》的篇名記得很少，只剩下「席方平」、「促織」，而唐宋傳奇的柳毅傳、李娃傳、虬髯客傳、補江總白猿傳却印象甚深，也許《聊齋》由於出自一人之手，又有數百篇之多，反而不能使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假期回去也看了些父親收藏的筆記，如朱國楨的《湧幢小品》、

落英（下）（魯）

張和仲的《千百年眼》。

那時有種普及的文藝刊物叫《文藝學習》，連載王瑤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講話》，中學生都按着他指引的路子看作品，抄錄他引的名句以至名段。

我在高中，副科仍舊「一以貫之」的不行，我的成績單上數理化成績都很好，數學可謂高分，其實是「弗來事」，考試時臨時抱佛腳。跟我的好友劉雨田不能比，他整天解題，還跟一位姓葛的興化同學互相出題考對方，我爲他們搭的橋，他們的題目我一條也不能解。我還是喜歡語文、歷史、地理。高一時有個作文題目是假期活動吧，我寫的是登泰山，可不是魯國的泰山，而是泰州城裏的泰山，泰州是平原，哪能有山？相傳岳飛被金兵困在這裏，快絕糧了，岳飛命軍士負土一夜而成此山，上置鍋巴，天明烏鴉銜食，有的飛至金營，金兵發現遂解圍而去。我寫了這傳說，而且引用了駱賓王爲徐敬業寫的檄文中的話：「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羅秉彝先生在我的這篇文章好幾處圈了雙圈兒，又打了「甲」。由於作文只能打等級，又算在「語文」成績內，所以成績單上的「語文」項下得個「90」，便屬不易了。如果把「語文」

析成「語」、「文」二字，那麼我是重「文」而輕「語」了。誠然「主語」、「補語」、「動詞」、「名詞」，語文課上老師講過，俄文課上聽說過，但是那時對語言學談不上什麼了解。

只是父親常和仲先生討論泰州話裏的有音無字的詞兒，例如表示緊貼的「*ка? 緊入*」，窮得很叫「*ка? 緊入*在鍋上」，父親認為應寫作「涸」，仲先生首肯。有次父親說到陶 *т. ч. и* 如何如何，我不懂，父親告訴我，是陶侃，我說年輕人念作陶 *т. с. и* 呀，這也許是我日後研究泰州話的潛在因素。不過我是抱着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報考中文系的。

一九五〇年起，大學開始全國統一招生，初期分三類：理工、醫農、文史。一直到現在，報考文科的有兩種人，少數是全面發展而熱愛文史的，多數是數理化不行才走此路的，我貌似前者而實是後者。在樹人堂側的小樹林裏背歷史年代，俄而太陽從東方升起，仰視頭上的樹葉，片片金黃，那奇妙景、色，至今仍映現在我大腦的屏幕上。

五四年大學錄取名單還先登在報紙上，好幾版，從五五年起只發錄取通知信，我焦急而愁悶地等錄取通知。那時店關了，我家庭經濟困難，人人都結漁網掙點錢，某日我正在

拿父親的網結時，郵遞員來了，我衝上前去，看見了信封上的「北京大學」四字，……

四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號，我坐浦口發的火車北上，終於來到了令我多年魂牽夢縈的首都。抵達時已是深夜，出站後北大新生接待站的老同學便帶我們一行十餘人到沙灘紅樓（北大原址，五二年搬遷進燕大址內）住了一夜。清晨走進了操場，原來這就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解放後名叫民主廣場，北大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就從這兒開始。早飯後參觀了紅樓內的毛主席工作室和李大釗紀念室（在一室內），到了地下室，是校史陳列館，其中有一頁舊式賬簿，上欄十幾人的名字，中有「陳獨秀」，右下方小字「肆佰元」，下欄有「毛澤東捌元」，這是當時的月薪底賬。然後被帶着坐公共汽車到西郊的北大。剛到學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未名湖、臨湖軒、蔚秀園都走過了；天安門、故宮、景山、北海、頤和園也一一參觀了；伙食又是那麼的好，於是半個月體重就增加了好幾公斤。

系主任楊晦先生給我們五五級做鞏固專業思想的報告，先介紹了坐在對面的我們慕名已久的教授、副教授、講師。他說，全國只有北大和復旦中文系今年起實行五年制，接着說，北大中文系是不培養作家的，會場頓然「小譁」起來，我作壁上觀，因為我早就沒有那種想法了。

第一學期上的課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代漢語、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引論，此外有俄文、人民口頭創作、邏輯、體育、馬列主義基礎。「馬列」課講的是《聯共（布）黨史》，每週四學時，三學期，是僅次於中國文學史的重頭課。到了學期末，我們緊張到恐懼的地步，因為當時學習蘇聯，考查課程在期末以前解決，只分及格和不及格；而三四門考試課程是採取口試方式，我們在中學從來都是筆試的，於是請高年級同學來介紹經驗。我的第一門考試課程是語言學引論，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進得考場，桌子上覆放了好幾張試題紙，我隨手抽了一張，上有三四道題目。略作準備後，走進裏間，只見高先生正坐，石安石先生（當時是助教）側坐。我逐條口頭回答畢，高先生提了幾個問題，我都沉着地答了，最後高先生說：「你答得很好。」我送

上記分冊，高先生簽名打分，那時也模仿蘇聯的五分制，但有的先生變作「優」、「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級制，其實「三分」和「及格」並不一致。高先生最後問我哪兒人，我才悟到，我的方音太重是使得他必須全神貫注地聽我答題的原因之一。

我的記分冊只記了兩學年四個學期，二下時只有一門考試，是朱德熙先生的現代漢語，這時反右鬭爭已經開始了。此後是五八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五九年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等運動，我們經常要到郊縣農村去鍛煉，上課就不正常，考試也不正常。既然沒有口試，也就不登記分冊了，後六個學期如果有考試分數記錄，那就由系裏裝在我的檔案裏了，而我是看不到自己檔案的。那麼自我估計，我只有一次馬列主義基礎課考試得了四分，其餘都是五分。北大中文系是全國最強的，一九五二年由北大、清華、燕大三校中文系調整合併而成，一九五四年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又併入，我們的老師多是全國第一流的專家。對各門功課我都喜歡，都用力氣去學，看各種各樣的參考書，那麼大的圖書館也給我提供了看雜書、閒書的好條件。那時我說不出有特

別的愛好，也無特別的專長，也沒有發表過一篇像樣的論文，只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上登過一篇短文而已，我的不少同學已嶄露頭角，甚至成就斐然。我學得全面，但也學得平平，這是對大學時代學習的自我評估。

本來對中國文學史課有濃厚的興趣，後來學外國文學課，我又讀了幾十種西洋文學名著，當然多是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原來對文學有興趣，怎麼後來去學語言學呢？一九五七年暑假，我已在北京呆了兩年了，學校發給我伙食費及三元生活費，過得可以，但是沒有回家的路費，一學期也進不了一次城。正好暑假系裏組織去張家口地區調查方言，我參加了，也產生了興趣。這年九月是三年級的開始，要分專門化了。楊晦先生和王力先生做動員報告，然後學生報名，大多數同學學文學，而自願學語言的人還少了些，我當時猶豫不定，這時孫維張因為我剛參加過方言調查，就來拉我學語言學。王力先生報告結束時也說過：「歡迎同學們找我交談。」於是我們幾個人就到了王力先生家的客廳，一席談之後我們就成了語言專門化的學生了。

我們是五年制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三年級才分流，但是

對我們語言班來說，文學課仍佔一半以上。中國文學史是最重的了，按原計劃分四段，每段一年兩個學期，每週六節課，每節五十分鐘時間。第一段是先秦文學史，第一學期是游國恩先生上的，他是北大中文系四位一級教授之一（另三位是楊晦、魏建功、王力先生。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是我們這個年級首先使用的，那時還是十六開的鉛印講義，上課前發，只管一兩課用，到學期末積累下來，已是厚厚一本了。我看，迄今為止，這是同類書中最詳備的，而且摘引古代學者見解，又有辨析，對學生頗有啟發，可循此以進，直接閱讀古註，我至今仍感謝這本書。游先生古書熟極了，教學又極認真，他把「列寧」說成「電鈴」，他還是臨川口音，羅常培先生的《臨川音系》一書就是記他的發音。他又非常謙虛，講到詩經古韻時，特別請周祖謨先生來講。

我們看課外讀物，有老師指定的，推薦的，也有自己找的。看今人的選本，也部分閱讀古註。到了大學，確實「境界始大」，《詩經》、《楚辭》、漢賦；《史記》、《漢書》、《文選》都進入了我們的案頭。這裏我要特別提到余冠英先生的

《詩經選》，我們那時都讀過。中學時即慕余先生的大名，入了北大方知余先生所在的文學研究所雖還在北大校園內，但已屬中國科學院領導了。余先生在書的前言中講，關於詩經押韻問題，請教了王力、周祖謨先生，但打開書，第一首《關雎》，「琴瑟友之」的「友」字古讀如「以」，和上文「采（古音ㄉ）」相韻。十年前我爲了寫一篇《幽風·東山》的「娟」、「蠋」二字音辨，曾順便翻閱了二十幾本近幾十年出版的詩經注譯之類的書，發現除了音韻學家編寫的外，其餘一談到古韻，或盲目抄襲清儒舊說，或錯誤叢生，甚至「滿紙荒唐言」。文學史家談漢賦、唐詩、宋詞，不迴避音韻問題者少，而論詩經，古韻是踢不開的絆腳石，有些文學史家不得不栽筋斗了，這也許是專業分得過細帶來的弊病。

第二段文學史即漢魏晉南北朝部分是林庚先生教的，林先生具有詩人的氣質、原來他本是詩人。學年的最後一課，林先生講文學史的「氣」，娓娓道來，一氣呵成，我們被吸引住了，不知不覺地兩節課就過去了，人人嘆服。日本教授有「最終講義」，往往講生平最得意的見解，看來林先生給我們年級上的「最後一課」也是這樣。記得魏建功先生古代

漢語課的最後一課是吟咏一篇古文，全教室一百個學生莫不屏息以聽，又無不掩口葫蘆而笑，待到魏先生誦畢，猛地大笑哄堂，而這時下課鈴聲不斷地從走廊傳來。

馮鍾芸先生教我們唐詩，我們學得扎實。此後上課就不正當了，所以我元曲、南戲、傳奇的知識就很缺乏。

那時對文學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很強調人民性、思想性。比如宋詞，大概本來是婉約派佔主流，解放後，我們學的則是大大肯定豪放派，近十四年，詞學界又有文章爲婉約派「平反」了，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的專業不是文學史，但是三十年來爲了研究宋詞韻，把五冊《全宋詞》全看了，有些則不止一遍，我就是不大喜歡淺斟低唱、纏綿悱惻。這倒不是因爲我是豪傑之士，我戴的是一頂「多誤身」的「儒冠」，我想這種態度感情必與青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很有關係，所處的大動盪的時代和個人的收入與支出也不易使我對婉約詞產生共鳴。

那時也有選修課，都是上一個學期，一週兩節。常請外面的專家來開課，例如文研所蔡儀先生的美學課第一節，一個可容二百多人的大階梯教室裏，走道上坐的人，窗子上爬

的人，後面站滿了人，跟文革大串聯時期的火車車廂差不多，只是教室裏沒行李架，要有，保證會有一批空中飛人。這是由於學生好奇，「美」還有個「學」？可是好景不長，漸漸地「門庭冷落車馬稀」，我是聽到最後，至今還記得每課必提及數次的《伏爾加維夫》的油畫。由於魏先生的提議，語言所的鄭貧先生來講《文心雕龍》，多用內證法，每說皆有一串證據。他一口的紹興話，開始我也全然聽不懂，但他邊講，不時邊板書，大概大腦有自發的聯想類推能力，聽到後期，已能聽懂百分之八十幾了，我要聲明，我至此時刻也沒研究過紹興話和北京話的語音對應規律。可是那些遼寧人、河北人還是搖頭嘆氣不已，細思起來，我沾了我是蘇北人的光，江淮方言是吳方言的鄰居啊。王力先生請陸志章先生講過漢語構詞法，「小羊尾巴」是課上常舉的例子。本系教授開專門化課的更多，如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最後每人交一首詩詞算成績，我搜索枯腸，填了首《訴衷情》，那時「一頂頂王冠落地」，正值伊拉克國王和賽義德首相被推翻，「詠其事耳」。吳組緬先生講《聊齋誌異》，分析用詞煉字，匪夷所思，言人之所不能言，原來吳先生是短篇小說作家，後作

者方能體會前作者的心與境，甘與苦，「事非經過不知難」，評論家達到這般境地憂憂乎難。

大躍進時代提倡學生自己編書，北大中文系五五級文學班（實際是三個小班，八十人左右）編的四卷本紅色《中國文學史》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們後來又編了《中國小說史》。我們語言班十八人集體編了《漢語成語小詞典》，那時是空前的，此後印了幾十版，幾百萬冊，現在看來是「小兒科」了。畢業時又和五七級語言班集體編了《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從各類書刊中抄了十萬張例句卡片，然後再編寫。我們前兩年學得比較扎實，在集體編書中又親身體驗了科研工作的程序，任務帶動學習，也讀了點書，培養了科研能力。

活動多是北大的特點，因為北大是最高學府，緬甸總理吳努在周恩來總理陪同下來北大禮堂做報告，講佛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參觀北大，鄧小平總書記陪同。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是在清華大學操場的露天主席臺上演說，北大上千名學生列隊前去，翻譯蹩腳，蘇加諾不時揮舞權杖，滔滔不絕，看來頗有氣勢。演說畢，我們北大學生等候列隊回校，忽聞場邊「騷亂」之聲，不久主席

臺上一位瘦瘦的高個子訓話：「清華同學熱情有餘，禮貌不足，竟然圍住汽車開不走，陳毅副總理很生氣。」接着一個圓圓臉的講：「我們清華同學要好好檢討。」後來才知道前者是高教部部長楊秀峰，後者乃清華教務長錢偉長。

政治報告、形勢報告是在可容三千人的大飯廳舉行，馬寅初做校長時特多，因為他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年高德劭，老面子大，請得到人。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時在馬校長、江副校長、蘇聯專家校長顧問的陪同下周恩來總理由南校門進入，身着秋大衣，舉右手向夾道歡迎的師生示意，真有風度。建軍節三十周年時總參謀長粟裕大將來做報告，兩層軍服，風紀扣扣得好好的，那正是盛夏，雖是北京，也够熱的了，粟裕連講了幾個小時。北京市長彭真、副總理李富春、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報告我們都聽過，胡耀邦在主席臺上極爲活躍，一次身子轉了三百六十度，青年人在臺下樂滋滋的。馬校長自己也做過人口論的報告，濃重的浙江口音。一九五八年我們聽了小範圍的批判他的人口論和團團轉的經濟理論的實況廣播，過了些時候他的辭職獲準。黨委書記、副校長陸平被任爲校長，此後的形勢報告多由外交部司長這一級別

的幹部來做了。

系裏舉行的多是學術報告，一般講一段時間（指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但是周揚有一次上午沒講完，下午繼續幹，他條理清楚，講得學生愛聽。有次在小飯廳，復旦的劉大杰、山大的陸侃如做報告，劉觀點鮮明，而陸則模稜兩可，說了這面，馬上又說那面，唯恐不周。本系的王瑤先生某次在報告中提到當時鄧拓的一篇關於《紅樓夢》的大論文，我記得題目開頭有「十八世紀封建經濟」幾字，王先生說鄧文引用《古今圖書集成》，不該這樣，接着說：「不要到外面說。」涉及時賢，往往只宜在內部議論議論，似乎是又一條常規，而鄧拓當時任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自是「時賢」，所以王先生這樣囑咐我們。我雖不能聞一知十或知二，但從王先生的話中，略窺寫論文的門徑。

印象很深的是楊晦主任到「五四」時往往要做一次「回憶報告」，我聽了一次，下次還想聽，他總是帶着崇敬的聲調講察校長如何如何，譚平山、朱自清是他的同班同學。他講，五四那天，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合，傅斯年口才好，有煽動力，學生們往趙家樓進發，第一個爬過圍牆衝入賣國賊

住宅的是楊晦先生，我們面前的這位東北口音的老人年輕時是何等的矯健啊。〔注〕

我後來到了南京，就感到報告少多了，遜色多了，而且南京的報告幾乎全是坐着做的。在北京，我聽的各類報告上百場，幾乎全是站着做的，周恩來、彭真莫不如此，馬校長七十多歲了，也這樣，他天天洗冷水澡，經常爬山。如果坐着，胡耀邦怎能打圈圈呢？

北大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學生社團特多，而且活躍，什麼京劇社、話劇社、詩社，每到星期五六和節日，就組織活動，張貼海報。電影演員極受歡迎，然而我一次也沒去聽他們的談諧生動的話語。我記得請過著名版畫家古元來做報告，我旁邊的一位同學問：「你是不是姓古？」中央美術學院的許幸之教授講文藝復興三傑，我至今還記得他展示的幾幅拉斐爾的聖母像，栩栩如生。有位同房間的同學告訴我，學生會準備請吳組湘先生做《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報告，第一次去的人不會說話，對吳先生說：「我們請了某某，某某某，他們不肯來，吳先生講一次罷。」其結果可想而知。吸取了教訓，過了兩週，第二位使者會說話：「北大同學都十分盼

望吳先生給我們做一次精彩的報告。」那次二百多人聽講，吳先生靠獨到深入的分析 and 鞭辟近裏的見解使全場「連一根針掉下來都聽得見」。

我在北京整整呆了四年，姐姐去向朱成功叔叔借了三十元讓我回一次家，現在的大學生不管寒暑假、暑假都必回到父母身邊，他們太令人羨慕了。五九年暑假前我已上完了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課和漢藏語導論課，又去山西的朔縣一帶調查過方言，平日也常跟魏建功先生（海安縣西場鎮人，西場解放前屬如皋縣）討論家鄉方言。因此一回到泰州就熱切地調查方言，仲先生、父親也感興趣，大力幫助我。我跑到城北菜場一邊聽一邊記。開學後陸儉明告訴我：「暑假去看魏先生，先生對你調查方言大加表揚，還把你給他的信拿給我們看呢。」返京途中登了真泰山，撫摸了「孔子小天下處」的石碑，那是因為父親鼓勵我：「大丈夫要學太史公那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趕回學校，遲到了大半天，做了個小檢討。

這裏我要講一個「故」事，題目就叫「彭德懷與袁家驊」吧。看到這，會有人驚訝：一位是百萬大軍的統帥，一位是

慈眉善目的漢語方言學教授，怎會有關係呢？不，是在彭德懷落難以後。那從來不問政治、不臧否人物的袁先生又怎會跟「反黨集團」的「頭子」有聯繫呢？其實既沒有關係，也沒有聯繫。就說他們曾經「邂逅」吧，可《現代漢語詞典》

的釋義是「偶然遇見（久別的親友）」。他們既非親友，又非偶遇。實在找不出詞兒，只得在二人名字間加個「與」字，這是否可以算是模糊語言的一例？彭德懷，自他平反之後，我就不斷讀到他自著的、別人寫的關於他的書和文，他比起中國舊小說或舊史上常舉的樣板忠臣龍逢、比干，亦不多讓，最後也落得妻離人亡的下場。據北京友人說，文革初期，周揚和彭德懷都被紅衛兵小將押上臺子坐「噴氣式」，九十度鞠躬，周揚是文人，不久就癱下了，而彭德懷畢竟是軍人，雖然老了，還能堅持幾個小時不動。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描述了彭總去廬山途中看到因大躍進而造成的災難，所懷的恫瘝在抱的感情，李銳自愧不如，袁袁諸公能有幾人？書中所附的童小鵬拍的那張彭德懷在廬山揆鬮的照片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彭德懷、張聞天最後還是做了檢討，作了保證，那不是魯迅所嘲諷的「天王聖明兮，臣罪當誅」嗎？我們不

應苛求古人（他們都已作古了），陶鑄不是勸告彭德懷，要像舊社會女人那樣從一而終，保持貞節嗎？他們是忠臣節士啊！否則，不會有下面的「故」事了。

我文革後看書報，才知道彭德懷罷官後住的地方叫掛甲屯吳家花園，掛甲屯跟宋初抗遼名將楊六郎有關，吳家花園則是明末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的園子。我在北大做學生時常從這個園子門口經過，特別是熱天到頤和園游泳，出了那個古色古香的西校門，不向右拐上大馬路，而是穿進蔚秀園。蔚秀園原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的園子，那時是北大生物系的水稻試驗田，田邊假山圍繞，如今大樓鱗次櫛比，非復昔日的稻香村景象了。出了蔚秀園的西門，對面是承澤園，也是北大的家屬宿舍區，小溪橫貫，玉泉山的水經此而東入蔚秀園，溪旁樹木叢生，鳥鳴不已。袁先生家就住在溪邊。沿承澤園圍牆迤邐斜向西北，周圍是農舍或田地，一二十步吧，有個不大的院子，門口有解放軍站崗，我們經過時總愛側面向裏看，其中有假山石，壘土高起，上有小亭。慢慢地風聞彭德懷成了右傾機會主義者以後就住在這裏。

再說袁先生，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抗戰時期在西南

研究少數民族語言，著《阿細民歌及其語言》，解放後是僑文製定組組長（副組長是王均先生），如今人民幣上印的拉丁字母的僑文就是那時定的。袁先生還主譯布龍非爾德的《語言論》，袁師母即錢晉華先生譯了裴特生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功德非淺。我們學生常說，袁先生有英國紳士風度。他有時戴着呢質禮帽，緩步而行，從不生氣，總是笑嘻嘻的。他愛在家附近散步，往往碰到另一個散步的人，開始時彼此不打招呼，漸漸以目或點頭示意。有一次袁先生提着噴壺澆花，一開門，這位散步時老碰見的人正向他門前走來，於是微笑打招呼：「請進。」那位也就跨進了門檻。請坐，敬茶，賓主坐定後，袁先生：「請教尊姓大名。」答道：「我就是彭德懷。」這是袁先生告訴他的研究生王恩保的，王比我低兩級。我想，他們兩位不會談什麼政治，何以見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大多受到衝擊，王力先生是「最」了，被紅衛兵打跌在地上，罰掃廁所等等。袁先生僅是資產階級教授而已，如果跟反黨集團的頭子談過什麼政治，肯定要受到株連，而彭德懷也不願殃及池魚的。順帶說一下袁先生的那頂呢質禮帽。北大學生有話劇社，孫維張是

演員，常把袁先生的禮帽借來做道具，有時還帶到宿舍來，大家搶着戴了玩，我也戴過。經過這些演員的粘有油彩的手和我們的不乾淨的手，等到歸還時，這頂高級帽子成了什麼樣子可想而知了。還有，每逢（陽曆）除夕學生們總要按班或按年級聚餐，自己燒菜。於是分頭向教授借餐具，師母們總是熱情地捧出一大探碗碟來，最後不免有張家的碗還到李家去的事。這也是當時一「俗」。

六〇年夏，畢業分配臨近了，要填志願表，我的第一志願是助教。但是領導上要一些年輕的去當研究生，我服從分配。專業是什麼，導師是哪位，不知道，我也不問，因為習慣於服從組織決定，而且我對語言學的哪個專業都愛好，又都沒有特別的愛好，至於導師，每位都是名家。暑假回校後，系裏指定我學漢語史，導師是周祖謨先生，從此我有了專業方向。

我們中文系的這個研究生班二十多人，三分之二要從校外考試、錄取，於是等到六一年春才算正式入學。記得周先生教我讀的第一篇文章是《陳澧切韻考辨誤》，第一次布置閱讀書目，講課，兩週後除講課外，評點我的讀書札記（提

前兩天交，解答問題，並布置新書目。那時是困難時期，頓頓吃不飽，飯碗外邊的一顆硬米粒也要啃進嘴，腮浮腫了，好不容易領到小球藻湯票。而周先生的書目布置得又多，有次我嚷吃不消，周先生知道後批評了我一通，從此我不敢再叫苦了。還是嚴好，學生總有惰性，不逼怎行？困難時期爲了「與民休息」，北大每周有六個晚上放電影，我在研究生期間看的電影不足十個，記得的只有《萬水千山》。這養成了我很少看電影電視的習慣。

比我低一屆的漢語史研究生牟國相、馮志白入學了，牟的導師是王力先生。王先生每兩周講一次，周先生也是，我們三個人兩邊都聽。有一次忽然在王先生客廳裏出現了第四位，那就是先生的長公子秦似，他解放前已是著名的散文家，又是老革命、高級幹部，這時他是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特來北大進修，跟王先生學音韻學。對這位師兄，因爲年齡、地位太懸殊了，我們不敢跟他搭訕。某日我們正埋頭筆記，忽聞鼾聲中作，不勝驚訝地擡起頭來，馬上就忍俊不禁，但還是禁住了，因爲王先生仍然在不緊不慢地講着脂部和微部的劃分問題，我們三人只好以目示笑，這也唯恐被先生看到。

落英（下）（魯）

我忍不住離座去洗手間，故意碰了秦似的腳，鼾聲於是告停，但等我返座時又作。後來知道秦似讀書必至深夜，胖子又易打呼。一九九〇年六月我在廣州還向秦似先生的長女王小華老師談起這段往事呢。

那幾年環境比較安定，也有讀書的氣氛。只要有點關係的課我都想去聽，只要有點關係的書我都要去看，真有點如飢似渴的樣子。哲學系任繼愈先生開佛學概論課，我總是坐在教室的前排。看到歷史系的海報，請王靜如先生做古突厥碑文的報告，我如期前往。朱德熙先生、林燾先生積極地介紹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爲年輕人定期舉辦講座，我的筆記記得比較全。一九六二年初我打報告申請業餘到中央民族學院進修藏語，導師書面證明力有餘裕，於是我每日去民族學院，風雨無阻，老師是周季文先生和一位拉薩人，如是者一個學期，但我這個旁聽生的小測驗成績漸漸地被小同學們拉在後面。葉蜚聲老師告訴我，袁家驊先生知道我去學藏語，高興得很。我還同時在經營我的自留地，寫《泰州方言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半年一稿，寫了六稿。

在研究生期間，每人都有一大堆看不完的書，所以雖然

二人或三人住一室，但我已經不大有時間去翻同室的學文學的同學的書了，但是我們還是有文化交流的。我曾和孫玉石（他的導師是王瑤先生）住過一室，在二十九齋二樓，兩人書桌相對。有一天，忽然他笑起來，然後把手上的書遞到我這邊，接過來一看是《女神》，他要我看的是《匪徒頌》，那是我很多熟悉的，大學時就讀過，一節「頌」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頌」了馬克思，也「頌」了列寧，一九二〇年前後就能如此，真不簡單！哪知我面前的這本《女神》「頌」的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而我們在馬列主義基礎課上知道，這兩人是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敵，我不禁愕然。再看看手上的這本《女神》，是一九二幾年的本子，於是相視而笑。

還記得畢業論文答辯過後，鬆了一口氣，看看雜書，《金瓶梅》我沒看過，而這書一般人是不能看的。我去問研究明清小說的孫文光、李靈年，他們說：「以前在我們書架上放了幾個月，你不早說？」接着打聽到五十年代文化部影印了極少量，只有專業的高級知識份子和高級幹部能買到，吳小如先生有一套，缺錢用讓給了林燾先生。我就向林先生

借，林先生說道：「周揚同志說：『我看了後，行年五十，猶不能無動於衷。』」再過幾年，我借給你吧。」文革後，我常見些青年教師坐在系資料室書庫裏看《金瓶梅》（不讓攜出），我如今當然有資格看了，然而太忙，顧不上看，行年五十，已無動於衷了。

那時常吃中藥，就借得中醫中藥書來看（文革中曾想改行去學中醫），他如哲學史、繪畫史、科技史的書也從圖書館借來閱讀，但是中國音樂史看不懂。文革前的北大中文系資料室書很多，我喜歡在裏面挨架挨層地去翻，城裏的東安市場、西單商場舊書店也是我流連忘返之所。「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可以形容我當時的心境。如果小結一下，這幾年的廣學博覽養成了我的不保守、不自封的學術思想，但是貪多騖遠帶來了不精專、不量力的大病，而且貽及今日，老之已至，所成甚微，悲夫！

追思往昔，令我後悔的事甚多，例如六一年初魏先生和周先生不約而同地建議我練毛筆字，我立即拒絕了，心想這時間不如用來學外文呢。到頭來外文也沒學好，這是我的致命傷。外文不好誠然是時代給我們這一代學人的烙印，但是

我應該自責，沒有在青年時代下鏗而不舍的功夫。

那時規定，研究生在專業課程學完後要有一個考試，而高班同學專業考試的成績不太好的較多，這給我們的壓力很大。經過六十三天的緊張準備，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臨到我考試了，王力、周祖謨、林燾先生主考，唐作藩先生是祕書。

我答完了試題紙上的問題後，王力先生接着提了一個問題，待我答完，已是正午，王先生說：「下午再考吧。」下午繼續提問、回答，天色暗下來了，令我退出之後不久，又召進宣讀考試委員會的評語：「平時學習努力，知識掌握全面，基礎扎實。回答問題有自己明確的見解，言之成理，敘述清楚。唯嫌重點不夠突出，今後應注意綜合概括的能力。考試成績評定為五分。」從夜裏兩點就繃緊了的弦至此才鬆下來。

次日發了個電報給練棟華：「五分」。這是約好的，如果考得差，怎好意思在這個寒假結婚呢？魏先生知道後說：「你還真要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一月十六日在二十九齋一樓西頭的朝北房間裏舉行了婚禮，同學們佈置得很雅緻，桌上放着糖果和茶水，晚上七點起，老師同學、同鄉陸續來祝賀，老師們還致祝辭，因為練棟華是小兒科醫生，祝

辭說兒子、孫子、玄孫都會受益，魏先生與王先生還背起《爾雅·釋親》中關於玄孫、來孫直至雲孫的一段，互相提示。

不久開學了，我進入了做畢業論文的階段，周先生建議我做宋詞用韻考，我說：「跟先生學了兩年，音韻、訓詁居多，古文字和語法也學了一些，爲了以後出去工作能全面些，我做語法論文吧，宋詞韻作爲業餘的題目。」先生欣然同意，本擬搞史記語法，而史記是大書，就改成《孟子句法結構初探》。這篇論文做得實在艱苦，搞了一年多，才勉強成文。一九六四年十月，按規定舉行了國家論文答辯，由校內專家王力、周祖謨二先生、校外專家呂叔湘先生組成答辯委員會。這是我唯一可以引以自豪的，文革後的研究生答辯委員會哪能有如此強大的陣容，中午出示了評語：「用力甚勤，觀察細緻，能從複雜的材料中尋繹出《孟子》中的一般句法結構的類型，立論也頗有可取之處。但對句法的重大問題如詞的問題、句的問題未加申論，邏輯性系統性還不够強。」可見這是篇不成功的論文。

此後一段時間，我就看看雜書，在舊《參考消息》上寫

寫毛筆字，等分配。某日，在燕南園的東北角遇見了王力先生，王先生說：「我正要找你，我現在教古代漢語，缺助教，在你正式分配前，先在北大做我的助教吧。」我連忙回答：「我哪能做王先生的助教？」師命難違，就這樣做了半個多學期。

我本可以留校的，是我自己執意要到南方來的，二十多年來我常常免不了爲此後悔。臨近畢業時，唐作藩先生代表王力先生（當時任系副主任，古漢語教研室主任）找我談話，要把我留校。我陳情：父母在江蘇，愛人在合肥，我願到南京大學工作，方光燾先生也同意接受我。過了若干天，王先生又再次讓唐先生找我，動員我留系，談了很長時間，可我仍是冥頑不化。

一九六五年初夏，我離開京門，拜辭師門。坐在南馳的火車上我不禁十分惆悵：失去的時候，才覺得彌足珍貴。

車窗外，落英數點，在風中飄蕩。

贅語

我出身窮鄉寒族，有幸在中學時代、大學時代受到了當

時最好的教育。不久，遭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爲老九到農場鍛煉，爬稻、澆糞、剪枝都幹過。一九七二年大學恢復招生，我回到南京，又可讀書了。時至今日，浮生已過大半，作爲學人，成績微微，雖然我也曾以「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邊苦作舟」勉勵自己。而今體力、視力、智力就衰，每當看到筆記本上的題詞「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一九八六年五月過南京爲國堯同志題——叔湘」，就嗒焉神喪。

爲了寫完這最後的幾頁，今天下午仍然從擁塞的家來到這校內靜室。太陽雖然仍有餘威，但風中透出絲絲涼意，道旁竟有焦黃的葉子被擦地刮起。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啊。一個人如果得其天年，那求學時代恰如他的春天。流水落花春去也，何人不然？何物不然？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於南京大學北園

這篇遵命文章終於寫完了。解放前的部分寫民俗多了些，因爲這些快要不爲人所知了。解放後則寫讀書爲主，「生活」爲輔，恕我這樣地分析偏正詞組「讀書生活」了。我應該將這篇文章作冷處理，然後再改幾遍，文中有些史實和時間需要

核實，但是規定的交稿期迫近，修改、補充只得俟之他日了。

我要感謝畏友蔣蔭楠兄，他一直鼓勵我，病中爲我指點寫作門徑，潤飾文字。小女練明澄也提出文字上的修改意見多條。楊震甲同志寄贈的有關家鄉的文史資料對我寫作頗有幫助，十幾位朋友、同鄉解答問題，惠借資料也令我感謝。

一九九一·八·廿九於南京鼓樓淵聲巷

末跋

處在中國史上這樣一個空前動盪、劇變的時期，雖是平頭百姓，也有好多見聞，然而能寫出的人畢竟是極少數。我喜歡讀史，我仰慕陶宗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準備退休後寫筆記、札記，連書名都想好了，叫《愚魯廬主絮語》。我沒想到寫什麼回憶錄，這次遵命寫時，原只想萬把字交差，但居然扯了四萬字。還有些「所聞」留待退休後寫筆記吧。比如陸志韋先生任燕京大學校長時，逢到研究音韻學，就將一個年輕職員召來坐在書桌旁，問《廣韻》某字的反切什麼的，那位職員脫口而出。他是高中畢業生，並不怎麼懂音韻學，他的職責就是背熟《廣韻》，回答陸先生的問題，後來陸先生

落英（下）（魯）

也離不開他，我想，姑名曰「人腦廣韻」。解放後，想把這位職員仍留在中文系，但他入黨了。這是林蕙先生告訴我的，那時他是陸先生的研究生。文革後林先生在金華講學，回北京途中，應邀攏南京，我還記得，他談這事時，我們師弟二人迎風站在長江大橋上，「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

再囉嗦幾句：像趙元任先生的自傳、《中華文史資料》裏的回憶文章，都是述往事，可謂回憶錄的「正體」，然而如果所述不是什麼大事，往往令人乏味。而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陳白塵先生的三憶，則敘中夾議，或敘中插敘，涉及時人時事，這可謂回憶錄的「別體」或「又一體」。魯迅的夾插，讀來文筆生動，但所言者乃前代之事，我們不甚了了。而陳先生的，令我不時發出會心的微笑，甚至擊節歎賞，因它觸及的是文革時事，我也經歷過這十年。去年我讀了錢鍾書夫人楊絳的《幹校六記》，跟陳先生的《雲夢斷憶》堪稱雙璧。鄙見：楊記爲陰柔之美，陳憶乃陽剛之美。陽剛就往往體現在那些枝節橫生的議和插敘上，令人興味盎然。記得陳先生每贈我一本書時，我和兒子魯明泓、女兒練明澄就搶着讀。去年夏天動筆寫這篇文章前，想把陳先生的三書找

出來再看一下，「急用先學」嘛。但是找不着，陋室太窄，床下足旁都是書。稿子寄出後兩個月，我翻出幾本山西方言志，「嚇，居然夾在這兒！」擲去積塵，急乎乎地看起來，我愛人練棣華喊我吃晚飯，我也沒聽見。讀畢，長歎一聲：「此老何可及也！」練棣華說：「你怎麼能跟他比，陳先生是大作家。」當翻開《少年行》時，面對「破題」不禁失色，我的《落英》模倣痕跡太重了，雖然天下文章一大抄，陳先生又是我的師長，但太亦步亦趨了。不過我寫作的當時確實沒看陳先生的書，要說看，那是幾年前的事。何以兩個破題如此相像？何以受他的影響很深？還是等待心理學家或是什麼學人去研究發微吧。

《落英》大部份是去年八月末在南京寫成的，「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花兒雖然開過，該落的就掉落算了。而這個「末跋」則寫於美國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本月四號這兒氣溫高達華氏七十五度，樹已抽芽。忽然驟冷，十一號鷄毛大雪。如今又轉暖了，春天總是要到的。

魯 國堯 謹志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注〕 楊晦先生乃忠厚長者，說他是「五四」那天第一個爬牆衝進趙家樓的學生，所言當不誣。昨日在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見易君左《火燒趙家樓》（臺北三民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六九年），說第一個進趙家樓的人是易克疑，他是敲玻璃衝進屋裏去的。也許易君左乃就其所見而言。魯國堯于麥迪遜。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追記） この文章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に京都大學文學部の主催で行われた講演内容に基づき、大幅に加筆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落英（上）更正

一頁上二行倒一字「想」改爲「憶」；三頁上倒三行十二字「之」刪去；八頁上倒四行二字「了」改爲「上」；八頁下倒一行倒八字「八」改爲「人」；九頁上倒三行十四字、倒二行十四字兩處「蘇」改爲「蘇」；十一頁上十一行倒二字「復」改爲「複」；十三頁上四行三四字「去聲」改爲「陰平」；十四頁下倒四行五字「疹」改爲「痧」；十五頁上六行倒四字「速」改爲「縮」。